

屈原论稿

聂石樵 著

中华书局

目 录

自序	1
第一章 屈原的时代	4
第一节 处于转变时期的战国社会	5
第二节 楚国的政治和文化状况	20
第二章 屈原的生平	32
第一节 《屈原列传》考析	32
第二节 屈原的诞生和家世	37
第三节 从为官到见疏	42
第四节 从放逐到沉江	48
第三章 屈原的哲学思想	51
第一节 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两家思想之异同	51
第二节 屈原对儒、法两家思想的继承及其在战国思想界 的地位	57
第四章 屈原的美政理想	63
第五章 屈原的批判精神	76
第一节 对楚王的批判	76
第二节 对贵族重臣集团的批判	82
第六章 屈原的爱国主义	93
第一节 历史上的爱国主义	93
第二节 屈原对历史上爱国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100

第七章 屈原对天、天神的探索、怀疑和否定	109
第一节 对天、天神的探索和责难	109
第二节 对天命、巫祝的怀疑和否定	116
第八章 屈原“求女”的意义	123
第九章 屈原赋所反映的古代社会习俗	133
第十章 屈原的辞赋	149
第一节 《离骚》	149
第二节 《天问》《招魂》	162
第三节 《九章》	175
第四节 《九歌》	200
第十一章 屈原的美学观点	226
第一节 发愤赋诗	226
第二节 内美与修能	233
第三节 比德君子	238
第十二章 屈原在艺术上的创造	244
第一节 比兴手法	244
第二节 浪漫主义精神	251
第三节 语言特点	259
第十三章 屈原精神与日月争光	268
跋	277

[附录]

屈原赋的历史意义	279
漫谈《九歌》	300
关于屈原三题	305

自序

屈原是我们国家、民族早期的重要作家，他的作品在我国的文化史、艺术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希腊神话在希腊艺术史上的重要地位相似。“希腊神话不仅是希腊艺术的宝库，而且是希腊艺术的土壤。”（马克思《论文化的各种形态（科学、技术、艺术）的不平衡发展》）同样，屈原的作品是我们民族文化中的珍宝，两千多年来一直成为历代作家学习、吸取不尽的营养，它以丰富的创作经验和卓异的艺术成就培育着我国文学艺术的成长。对这样一部伟大作品的价值和意义，我们的认识还是很不够的。因此，我们必须下大功夫，作认真的研究，进行新的开拓。

比较长的时期以来，在对屈原的评价中，人们习惯于论述和划分屈原的思想究竟是属于哪一哲学体系，是儒家？法家？还是其他什么家？我在本书中对此也作了一些探讨。但是，仅从哲学的角度评价屈原，还不能全面地认识屈原。恩格斯在评论歌德时曾经说：“一般说来，我们根本不是从道德的、党派的观点，而主要是从美学的、历史的观点来对他加以责难。”（《论歌德》）恩格斯这段话可以作为我们评价古代作家的重要准则。我们并不反对用哲学的观点来评价作家，并且认为哲学观点是一个作家观察、分析自然和社会的主要根据，是其世界观的主要部分，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从文学反映生活的特点出发来评价作家。文学与哲学之用逻辑思维表现对整

个世界及其规律的认识绝然不同，而是用艺术的形式、形象思维的方法来反映社会斗争、历史生活，并从而表现作家对社会、历史的观点和看法的。因此，一部伟大的作品往往是它那个时代的一面镜子，是社会历史生活的实录。高尔基曾说：“卡尔·马克思承认在巴尔扎克的作品里面学习了很多东西。依据左拉的小说我们可以研究整个的时代。”（《青年的文学和它的任务》）对文学家及其作品只有用美学的、社会历史的观点才能真正认识它的价值和意义。对屈原的研究也不能例外。

这部《论稿》就是力图用这种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屈原的时代、生平、思想、作品进行比较全面、系统的探索；力图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阐明屈原所处的时代背景，阐明屈原及其作品和他那个时代的深刻联系，阐明屈原及其作品出现在那个历史转变时期的意义；同时，探讨屈原的哲学思想的形成，反映战国时期怎样的历史变化及其在当时思想界的地位，探讨屈原美政理想和美学观点的阶级内容及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进步性和局限性，探讨屈原对楚国贵族集团批判的认识价值；并且分析屈原对天命鬼神的怀疑精神的意义，分析屈原在艺术上对先秦文学的发展和创造，分析屈原对艺术的创造为后代文学家提供了哪些创作经验，等等。总之，想通过以上的论述全面地认识屈原、评价屈原，说明屈原的思想和作品怎样深刻地反映他那个时代、表现他那个时代。为了说明问题，比较多地引用了一些文献资料，并作了一些必要的考证。

屈原的成就是伟大的，他的伟大之处除了在他的作品中“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来”（列宁《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之外，还在于他和那个腐朽没落的贵族政治集团顽强的斗争精神，在于他为坚持自己的理想而宁死不屈的意志，在于他始终站在进步的立场维护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意向，在于他那种

出于污泥而不染的高尚情操。屈原在政治上终于失败了,但是他一生的斗争经历,他的思想观点,他的爱憎感情,他的情操,他的气质,他的全部精神意向,都集中表现在他的创作之中,他的全部创作是他整个精神世界的再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史记·屈原列传》)司马迁是为屈原精神所感召而含着血泪为屈原写传记的。同样,我们今天也为屈原的悲剧精神所激动着,我是怀着同情、愤慨和崇敬的心情完成这部《屈原论稿》的。我觉得屈原的成就是我国人民和我们民族精神、文化对他哺养、培育的结果,因此,他的产生是我国人民的骄傲,是我们民族的骄傲!

我对屈原的考察、探索工作,时间拖得比较长。在比较长的时间里,积累了一些资料,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但由于教学工作比较重,一直没有机会动笔写。一九七八年冬天,因为要给研究生讲屈原专题,才不得不挤时间撰写这部稿子。初稿完成后,自己很不满意,又经过几番修改,最后才定下来。后来承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同志提了不少宝贵意见,帮助进一步修改,不胜感激!这部稿子从开始着手写到现在已经两三年的时间,现在终于完成了,自己也松了一口气。但回顾起来仍感到很不满足,特别是受到政治思想水平的限制,对怎样正确运用马列主义观点评价文化遗产把握不准,其中有些地方论述得不充分、不全面,有些提法不确切或有错误。这只是一初步的探索,故称之为《论稿》。现在出版,不过是想多听取读者和专家的批评罢了!

聂石樵

一九八〇年六月十五日写于北京师大

第一章 屈原的时代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又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就文学家而言，屈原的辞赋，司马迁的散文，杜甫的诗歌，关汉卿的戏剧，曹雪芹的小说，都在他们各自的领域中达到一种文体的最高成就，标志着一个时代文学发展的顶峰。重点、深入地分析、批判和研究这些伟大作家，对于探讨文学发展史的某些规律，对于理解、批判、继承和古为今用，都是有重大意义的。

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伟大文学家。作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他的作品总是和他那个时代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列宁在评列夫·托尔斯泰时说：“如果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真正的伟大艺术家，那末他至少应当在自己的作品里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的方面来。”那么，屈原这位伟大的辞赋家，他的作品中究竟反映了什么样的时代呢？他自己所处的又是怎样的时代呢？

第一节 处于转变时期的战国社会

屈原生于公元前三三九年(楚威王元年),卒于公元前二八五年(顷襄王十四年),共经过了威王、怀王、顷襄王三个王朝。怀王统治的时期共三十年,正当屈原十二岁到四十一岁的时候,屈原的政治活动和创作活动主要在这个时期。这个时期正是战国末年。

从春秋到战国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大转变的时代,这一点从前研究历史的人已经看到了。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卷末《叙论》四说:

战国者,古今一大变革之会也。

他又在同书卷五《汉哀帝》条中说:春秋以前“其富者必其贵者也”,待到郡县制度之兴起,则富贵的情况便发生了变化。顾炎武在《日知录》卷十三《周末风俗》条中更具体地说明了春秋战国之间的变化:

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尊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史之阙文而后人可以意推者也。

他们虽然没有认识这一时代变化的根本原因,但他们看到这

一时代的变化，却是难能可贵的。这是一种新旧制度的变化，是新旧社会的变化，是从奴隶主所有制向地主所有制、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大转变时代。但是，从整个进程来看，这种转变在春秋初期还比较缓和，越到后期越趋向剧烈，到战国中、晚期，便达到剧烈的顶端。屈原就是活动在这一历史变化的潮流中，活动在这一新旧社会交替的历史转折关头。

这个时期的历史有哪些变化，让我们先看看当时的经济情况。农业是当时生产的最重要的方面，铁制工具的出现是农业生产的一件大事。铁在春秋末年已经发明利用，但当时似乎只用作铸鼎，到战国中叶以后，被广泛用于制作农具。《管子》的作者认为必须铁制工具，“然后成为农”，“然后成为车”，“然后成为女”（《轻重乙篇》），“不尔而成事者，天下无有”（《海王篇》）。当时有位“为神农之言者”许行，主张君民并耕而食，孟子询问他的弟子陈相：“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孟子·滕文公上》）可见当时中原地区已经普遍用“铁耕”，所以孟子才以此责难陈相。当时的一般农具像耜、铧、镰、耨、铎等都是铁器，这种铁制农具的出现，对大规模的垦荒和深耕易耨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牛耕在春秋末年已经出现，从山西浑源出土的牛尊看，当时晋国的牛已经穿有鼻环，说明牛已被牵引着劳动。可能在孔子时代人耕和牛耕还并用，所以《论语·微子》篇有从事“耦耕”的长沮和桀溺，同时根据古人的名和字相连的习惯，《史记·仲尼弟子列传》里有字子牛的司马耕和字伯牛的冉耕。春秋晚年，晋国的范氏、中行氏在国内斗争中失败，逃到齐国，使子孙变为农民，晋大夫窦犇说：“今其子孙将耕于齐，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国语·晋语九》）意谓好比养在宗庙里祭祀用的牺牲放到田地里耕作。这也说明春秋晚期牛耕已比较普遍。到了战国，牛耕的作用更被人们所认识，从而得到进一步地推广，所以《易·系辞下》说：“服

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

这个时期，人们也注意到了对土壤的研究，主张先分辨土性，选择适宜种植在某种土壤的农作物来播种，从而适当地改造土壤。同时讲究施肥的方法。战国时的著作《禹贡》和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周礼·地官司徒·草人》列举了各种不同的土壤。《吕氏春秋·任地》篇提出了土壤的质地、结构、含水量等方面的保养方法：

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劳，劳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缓，缓者欲急；湿者欲燥，燥者欲湿。

从五个方面对不同土壤采取不同的改良措施。在施肥方面，《周礼·地官司徒·草人》云：

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宜而为之种。凡粪种，驛刚用牛，赤缙用羊，坟壤用麋，渴瀉用鹿，咸瀉用豕，勃壤用狐，埴垆用豕，强浍用蕘，轻鬻用犬。

把土壤分成九类，根据土壤之不同，用九种动物骨煮成汁来拌种播种。这是当时使用骨肥的情况。又《周礼·秋官司寇·薙氏》云：

薙氏掌杀草……若欲其化也，则以水火变之。

或烧草取灰烬，或沤草使腐烂。这是当时使用草肥的情况。此外，《孟子·滕文公上》篇，《荀子》之《王制》、《富国》、《致士》诸篇以及《礼记·月令》篇都谈到粪田和粪肥田的问题。《吕氏春秋》

的《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是专讲农业生产的，其中包括使用土地、整地、做畦、灭草保墒、中耕除草等各个方面。这说明战国时的生产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灌溉事业也有很大发展。就楚国而言，早在春秋时之楚庄王，其宰相孙叔敖即创建芍陂灌田。《水经·肥水注》云：

断神水又东北径白芍亭东，积而为湖，谓之芍陂。陂周百二十许里，在寿春县南八十里，言楚相孙叔敖所造。……陂有五门，吐纳川流。

这项水利工程是利用原有的湖泊而建成的大型蓄洪水库，而且设有水门。在还不能用人力大规模修筑水库以前，这种利用湖泊作基础兴建水库的方法，特别是设立水门以调节水量的方法，是当时水利工程中的大进步。到战国时期，水利灌溉进一步发展。《周礼·冬官考工记·匠人》记载当时灌溉农田的大小沟渠有“ ”(田间小沟)、“遂”(小沟)、“洫”(中沟)、“浍”(大沟)等名目。人们还注意水的流通和运用。《周礼·地官司徒·稻人》云：

以渚(池塘)蓄水，以防止水，以沟荡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浍(泻)水。

这种农田灌溉的讲求，也就发展了大规模的运河开凿工程，如魏文侯时的西门豹、魏襄王时的史起引漳水灌溉邺田，《史记·河渠书》、《汉书·沟洫志》都有记载。当时的灌溉技术也有比较大的改进，《庄子·天地》篇云：

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

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搯搯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为圃者仰而视之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沃汤，其名为槩。”

把两种工具的功能，作了鲜明的对比，说明当时楚地已采用桔槔灌溉，代替过去抱瓮而汲的原始方法了。这种灌溉方法的改革，可以“民逸而利多”（《淮南子·汜论训》），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劳动力而便利农耕。

和农业发展的同时，手工业也蓬勃发展起来。在官营手工业方面，战国时各诸侯国普遍设有自己的手工业作坊，以制造国君和宗室所需要的兵器、钱币和其他各种器物等。重要的手工业地点，遍及全国各地。根据已出土的兵器和铜币的铭文看，秦国有雍（今陕西凤翔县东）、栎阳（今陕西临潼县北）、咸阳（今陕西咸阳市东北）、高奴（今陕西延安县东北）和漆垣（今陕西铜川市西北）。魏国有梁（今河南开封市）、宁（今河南获嘉县）、共（今河南辉县）、阴晋（今陕西华阴县东）、宅阳（今河南郑州市北）等。赵国有邯郸（今河北邯郸市）、武平（今河北霸县北）、兹氏（今山西汾阳县东南）等。韩国有郑（今河南新郑县）、新城（今河南伊川县西南）、阳人（今河南临汝县西北）、彘（今山西霍县）等。当时手工业的发达，更表现在分工的细密上，据《周礼·冬官考工记》记载，官营手工业木工分七部，金工分六部，皮革工分五部，设色工分五部，刮磨工分五部，陶工分两部。具体到某一工种，还有更细的分工，例如做一轮车，就有轮人、舆人、辀人之分，制造技术也十分讲究。其他各工种也莫不如此。

除了官营手工业之外，民间个体经营的手工业也相当发达。早在东周末期已出现如《论语·子张》篇所谓“百工居肆”和《墨子

·尚贤上》所谓“工肆之人”的个体手工业者。到了战国时代更加发展,《孟子·滕文公上》云:“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就是说对一个人来说,各种工匠的成品都不可缺少。因此他主张工农的产品要交易,《孟子·滕文公下》说:“不通功易事,以羨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如果有无相通,“则梓匠(木工)、轮舆(车工)皆得食。”又《孟子·滕文公上》说:农夫“以粟易械器”,陶冶工“以其械器易粟”,“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说明当时农夫和个体手工业者的相互依存的关系。特别是陶工、木工、车工、冶铁工的发展,对农业生产更重要。农夫所需要的铁器、陶器、木器、车辆,都依靠这些个体手工业供给,而个体手工业者则依靠出卖制成品给农夫以维持自己的生活。《韩非子·五蠹》篇说:

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侷农夫之利。

个体手工业者与农夫不但相互依存,而且制造恶劣的器械以剥削农夫。这种个体手工业者必然不少,产品也一定很多。特别是由于铁制农具的盛行,民间冶铁手工业,为了“侷农夫之利”乃成为最重要的部门。

由于农业、手工业的蓬勃发展,商业也兴盛起来。当时一般的商人和手工业者可以取得十分之二的利润,据《史记·苏秦列传》说:“周人之俗,治产业,力工商,逐什二以为务。”但富商巨贾却垄断市场、囤积居奇,《孟子·公孙丑下》说:“有贱丈夫焉,必求龙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网)市利。”他们登高远望,左顾右盼,把市场垄断了。又《战国策·赵策三》记载希写对建信君说:“夫良商不与争买卖之价,而谨司时。时贱而买,虽贵已贱矣;时贵而卖,虽贱已贵矣。”他们经营的方法,关键在掌握时机。像楚

人范蠡用计然的贸易理论，“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史记·越王句践世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史记·货殖列传》）。周人白圭讲究致富术，用“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史记·货殖列传》）的法则从中牟利。大盐商兼珠宝商猗顿也多钱善贾而富比王侯，名驰天下。这类富商巨贾的经济实力，甚至能够左右一国的兴亡。《韩非子·亡征》篇说：“羁旅侨士，重帑在外，上间谋计，下与民事。”他们依靠在国外的经济力量，上干国政，下预民事，影响别国的安危。《孟子·公孙丑上》举王天下之道五条，其中“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招商、通商便占了两条，可见商业发展在各国经济中所占地位之重要。商业兴盛，城市自然也发达起来。齐之临淄，楚之郢都，赵之邯郸，魏之大梁，周之洛阳等都是天下著名的都市。临淄有户七万，“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战国策·齐策》）郢都的繁华也不下于临淄，“车挂毂，民摩肩，市路相交，号为朝衣新而暮衣敝。”（《北堂书钞》卷一二九，《太平御览》卷七七六引桓谭《新论》）此外，“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战国策·赵策三》赵奢语）天下各国比比皆是。商品的流通极其畅达，《荀子·王制》篇叙述当时的情况说：

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弦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

又说：

通流财物粟米，无有滞留，使相归移也，四海之内若一家。

商业的流通和发达，给学术上大一统思想的形成以有力的影响。

这个时期生产的发展，主要是由于铁制工具的普遍使用所促成的。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导致生产关系的改变，生产关系的改变，必然导致社会结构、阶级关系的变化，必然导致一切旧制度、旧观念、旧思想的动摇。

春秋战国以前，各诸侯国家的政权都掌握在大小奴隶主手里，土地由世袭的诸侯、卿、大夫所占有。到了春秋时代，这种奴隶主占有制严重地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奴隶主阶级已成为社会上最反动的阶级，阻碍着历史的前进。他们搜刮民脂民膏以满足自己穷奢极欲的生活，追求声色犬马的玩好和宫室台榭的享受，根本不考虑人民的死活和国家的安危。《墨子·辞过》篇说：

当今之主，其为宫室……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其为衣服……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锦绣文采靡曼之衣，铸金以为钩，珠玉以为佩，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镂，以身服此，非云益暖之情也，单财劳力，毕归之于无用也。……厚作敛于百姓，以为美食与黍蒸炙鱼鳖，大国累百器，小国累十器，前方丈，目不能遍视，手不能遍操，口不能遍味，冬则冻冰，夏则饰昧。……其为舟车……必厚作敛于百姓，以饰舟车，饰车以文采，饰舟以刻镂，女子废其纺织而修文采，故民寒，男子离其耕稼而修刻镂，故民饥。

墨子所讲的是各诸侯国的普遍情况,《孟子·梁惠王上》又谈到当时齐国的情况:

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

齐国是号称有鱼盐之利的大国,人民生活尚且如此困苦,其他国家就可想而知了。《孟子·梁惠王上》还谈到魏国的情况:

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

《诗经·魏风》反映魏国的阶级矛盾在十五国风中已经比较突出,这时则更尖锐化了,竟至于饿莩遍野。统治阶级追求骄奢淫逸的生活,甚至像虞公那样,为了贪图晋国的“垂棘之璧”和“屈产之乘”,把自己的国家葬送了;像卫懿公那样,因为喜爱鹤,竟然用一个大夫一年的俸禄养一只鹤。而秦穆公买贤士百里奚,只用了五张羶羊皮。这说明当时一个奴隶的身份,还抵不过奴隶主一只鹤。

这些统治者为了满足自己贪得无厌的欲望,不但剥削本国人民,还掠夺别国人民。他们经常动员十几万或几十万人,发动大规模的对外战争。这一方面摧残了别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另一方面也加重了本国人民的负担,并严重地破坏了农业生产。《孙子·用间》篇说:

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

战争给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人民对之深恶痛绝。《孟子·梁惠王下》记载邹与鲁交战：“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即说明邹穆公的士卒反对这种不义之战，不肯为他们卖命。战争扩大了，徭役也日益繁重，大批奴隶因而死亡，著名的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应当就是这个时期历史现象的真实反映。

统治阶级对工人奴隶也极尽摧残之能事，《韩非子·和氏》篇记载：楚厉王、楚武王昏愤至极，以为献给他们璞玉的玉工和氏是妄骗，就把和氏的双足割掉了。这虽然是一篇寓言，却反映了当时的历史事实。又《搜神记》记载：

楚干将莫邪为楚王作剑，三年乃成。……王怒，即杀之。

楚王因为干将莫邪铸剑时间太长，于剑既成时，便把剑工杀了。多么残忍！又《阙子》记载：

宋景公使弓工为弓，九年来见，公曰：“为弓亦迟。”对曰：“臣不得见公矣，臣之精尽于弓矣！”献弓而归，三日而死。

为了制造一张弓，竟把全部精血都耗尽了。又《左传》宣公二年记载：

晋灵公不君……宰夫胹熊蹯不熟，杀之，寘诸畚，使妇人载以过朝。

晋灵公因为厨师煮熊蹯不熟，遂将厨师杀了。玉工、剑人、弓匠、厨师四种人的悲惨遭遇，正是当时工人奴隶苦难命运的写照，是奴隶主阶级残酷本质的反映。这些奴隶主榨取人民的血汗，作为